

衙门

为官中国千年史

口

张程◎著

衙縣

官本位里看乾坤，大历史中见真实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衙门

为官中国千年史

口

张程◎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衙门口 / 张程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 - 7 - 224 - 10505 - 6

I. ①衙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官制 - 中国 - 古代 IV. ①D691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20124 号

衙门口：为官中国千年史

作 者 张 程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 (传真): (010) 88203378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6 开 16.75 印张 223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0505 - 6

定 价 32.00 元

序

梅毅

（著名历史作家、央视“百家讲坛”主讲人）

衙门口是一个奇妙的地方。站在衙门口往里看，可以看到官场百态，看一个个官员粉墨登场；站在衙门口朝外看，可以看到市井炎凉，看社会如何围绕着衙门运转。看不懂没关系，所谓“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”，在衙门口看到的一幕幕，保管精彩。说不定，一不小心看到了不该看的，就会连累“衙门口”成了一个“敏感词”。

现在，我的老朋友张程就选择站在衙门口，对着读者诸君大谈特谈古代衙门和官场中人。他谈了衙门和官吏的方方面面，大到王朝的官制，小到官员轿子的规格，每个方面都独立成章，又在逻辑上紧紧相扣，最后组成了这本很好看、很耐看的书。书名就叫《衙门口》。这里面的内容，表面上都在谈古代官场，谈古代官员的工作和生活，实际上，它在谈衙门在古代社会的巨大影响，在谈古代中国人对官场的追捧和无奈。

一开卷，《衙门口》就直言“科举考场通向官场”，古代社会对科举的痴迷就是对官场的痴迷，接着分章节介绍了古代人该如何进入官场，

进去后怎么生活、怎么工作、怎么退休，以及退休后的待遇和晚景。把这些内容串起来，就是古代官员的一生了。之后，书中辟出三章，介绍在衙门里流传的“官场病”、“衙门规律”和从古代笔记、小说中挖掘的官场案例。如果哪位读者设身处地，把自己嵌进去，说不定能过一把在古代当“官老爷”的瘾。

我以前看到过不少讲古代官场的图书，其中多数是浮躁的出版商找人拼凑或者“编著”的，内容不忍细看，更不能当真。也有一些是象牙塔中的先生们的大作，一写出来就准备束之高阁，或者当做“著作等身”中的一本的。多数读者看不懂，也看不下去。但是，张程这本书不同，既通俗又不失严谨，既扎实又不枯燥晦涩。张程是北大政治学科班出身，又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青年历史作家，写的东西有学院气，又照顾读者的阅读喜好。他不是为了写衙门而写，而是想把衙门写好，把衙门里的古人写活，从正史、野史、趣史中拉出了不少有趣的人和事来摇旗呐喊，来说服读者、吸引读者。

看了后记，我才知道，在这本书中，“正史与小说、典故与白话、权力斗争和制度变迁、政治史和社会史并肩而立，读者们可以穿梭在达官显贵、下僚小吏、落第士人、隐士僧侣甚至市井小民中间，徜徉在不同的朝代和琳琅满目的衙门之间。”我特意闭上眼睛回顾了一下刚刚浏览的内容，还的确有那么一点“徜徉”在古代市井中的味道。

这趟“徜徉”的感觉是沉重的。衙门制度（官僚制度）是我们历史的一大特产，这个制度的弊端和成就一样明显。“腐败就是政治的顽疾，像癌症一样无法根治”、“官衙的后门直通造假工厂的正门”、“论资排辈的升迁环境，也迫使官吏们要少做事、少出错，争取‘无灾无病到三公’”、唯上和圆滑的古代官风、恋栈不去的老官僚等，无不指出古代官场的弊病。而种种官场病态的集大成者就是弥漫中国社会的“官本位”思潮。由此，这本书深入到了社会层面。张程从社会史的角度看中国历

史的变迁，这也是现在历史图书的一大写作趋势。

我建议那些有意于衙门人生的“有志青年”，在急着往衙门里面扎之前能够站在衙门口，看看古代官场的生态和市井炎凉。

我也建议以下人群不必阅读本书：两岁开始看“新闻联播”现在佩戴“五道杠”的人；认为阳光下的一切都是光明的人；忙着背英语单词准备出国做世界公民的人。我建议其他读者，都应该好好读读《衙门口》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第一章 科举：古代官吏的考取途径	/ 1
第一节 科举还算是个好东西	/ 2
第二节 科举之难，难于上青天	/ 12
第三节 别有一番苦滋味	/ 24
第四节 考试定终身，悲喜两重天	/ 29
第五节 金榜题名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	/ 34
 第二章 职责：古代官吏的职场生活	 / 41
第一节 走马赴任和身份证明	/ 42
第二节 古代官吏的具体工作	/ 47
第三节 难缠的衙门小鬼	/ 57
第四节 官员也有难念的经	/ 67
 第三章 官魅：全民狂热的原动力	 / 76
第一节 当官的经济账	/ 77
第二节 古代衙门的“三公消费”	/ 87
第三节 编制外的官人和衙门	/ 95
第四节 古代官吏的青楼梦	/ 101
 第四章 规矩：衙门里的明规则与潜规则	 / 108
第一节 绕不开的体制“暗箱”	/ 109
第二节 新官上任必烧的三把火	/ 115
第三节 有些事儿比政绩更重要	/ 121
第四节 为官切忌犯众怒	/ 130

第五章 捷径：官员任用与升迁的争斗 / 136

- 第一节 古代官场的人脉关系 / 136
- 第二节 官吏的圈子与群体 / 145
- 第三节 “唯上”与“圆滑” / 149
- 第四节 官场的“名”与“利” / 156

第六章 谢幕：退休制度和官员晚年生活 / 161

- 第一节 退休前后的挣扎 / 162
- 第二节 “被退休”的无奈 / 168
- 第三节 古代官吏的退休生活 / 175
- 第四节 盖棺论定身后名 / 179

第七章 病态：古代官吏的“职业病” / 187

- 第一节 官场礼多人情薄 / 188
- 第二节 寒暄声中的禁忌 / 195
- 第三节 自古忠孝“两不全” / 200
- 第四节 腐败是官场癌症 / 206
- 第五节 “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” / 216

第八章 怪圈：衙门背后的权力规律 / 222

- 第一节 “海瑞—李用清现象” / 223
- 第二节 王朝腐败周期律 / 231
- 第三节 “清官”不一定是好东西 / 238
- 第四节 人生终须一个土馒头 / 244

参考文献 / 249

附录：清代官职表 / 251

后记 / 255

第一章 科举：古代官吏的考取途径

清朝某年的江苏乡试，应考的考生中有位拄着拐杖的老秀才，挤在入场的人群中蹒跚而行，引人注目。主考官仔细打量这名老秀才，大吃一惊：这不是当朝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王鸣盛的父亲王尔达吗？他忙走上前劝王老秀才说：“老伯正当颐养天年，不必来吃这苦了。”王尔达正色说：“你错了，大丈夫奋志科名，应当自己取得，如果借着子孙之福，自暴自弃，我深以为耻。”王尔达的这份执著在科举时代赢得了一片赞叹声。这片声音的背后隐藏着全社会对科举功名的尊崇和追求。科举入仕是千年官场的正途，如果一个人不是通过科举而是通过其他途径做的官，即使位极人臣也觉得是个遗憾。晚清名臣曾国藩 28 岁时以第三甲 42 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，应该说年轻有为，很拿得出手了。但曾国藩却对此耿耿于怀，引为终生憾事。为什么呢？他嫌自己的名次太低了。

要想考察中国古代官场和官场中人，科举是绕不开的话题。科举引得无数读书人竞折腰，皓首穷经，孜孜以求，进而塑造了读书人的言行操守。科举不仅仅是读书人入仕的准入证，做官的敲门砖，还渗入官员的交往进退、宦海沉浮；它不仅仅让士大夫们沉溺其中不能自拔，还像是一张网，包裹住社会的方方面面。科举考场直接通向官场，对科举的痴迷就是对官场的痴迷，对功名的追求就是对官位的追逐。科举网络对社会的包裹，其实就是“官本位”思想在社会的泛滥。因此，科举不单是一项政治制度，还扩散为政治的背景因素。

第一节 科举还算是个好东西

知识分子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？是如何实现个人价值。读书人空怀满腹经纶，徒有一腔抱负，实现不了，只能发发“怀才不遇”、“冯唐易老”的感慨，于人于己都无益。现代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很多，可以经商致富，横跨农工商各业，用金钱来衡量自我价值；可以投身艺术，在歌舞、书画、戏曲等领域里驰骋，张扬个性，追求精神满足；还可以教书育人，在学术殿堂中著书立说乃至开山立派。然而，古代读书人的途径很窄。你去经商，官府对你征收繁重的税赋，将你视为不稳定的低等阶层，老百姓则认为“无商不奸”，把经商致富的人视为“暴发户”、“为富不仁”；你去做工匠、画画卖字或者作曲唱戏，别人视你为贱民，和乞丐同流，还要连累得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；你去教书育人做学问，可官学都是政府兴办控制的，里面品级森严，俨然一个小官场，去教私塾则要仰人鼻息，为生计奔波，很难安心做学问。于是，古代读书人可选的道路几乎只剩一条：做官去！只有做官才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平台，才有可能让理想化为现实。

有人说，我不当官，我去做和尚道士，或者归隐山林，总可以吧？且不说大多数的人达不到出家或者归隐的境界，就算达到了你也还要解决两个问题：一个是要官府的人承认你的身份，给你发个度牒，不然的话你就是“野和尚”、“游方道士”；一个是解决吃穿用度的物质基础问题。晋末的陶渊明是读书人归隐的先驱、千年闻名的隐士，可除了最初的三四年光阴，陶渊明归隐的大部分时间生活窘迫，最终在饥寒贫病中死去。没有“阡陌纵横”的经济基础，世外桃源只能是个传说。在古代，出家和归隐更多的是读书人自我炒作、自抬身价求官的终南捷径。

所以，古代读书人如果不想蹉跎一生、无所作为，就必须去做官。

士（读书人）和仕（做官）合二为一。儒家宗师孔老夫子就在仕途上孜孜以求，三日见不到君主就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；亚圣孟子更是大呼帮助君主治乱平天下“舍我其谁”。孟子进一步说明：“士之仕也，犹农夫之耕也。”“士之失位也，犹诸侯之失国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比两位圣人晚些时候的苏秦刻苦学习，留下了“刺股读书”的典故，应该说学识渊博、能力出众，但长期没有官做，生活穷困潦倒，“羸滕履蹢，负书担橐，形容枯槁，面目黧黑”，连父母兄嫂都不理他，真可谓是孟子所说的无地流民、亡国诸侯。待到游说诸侯成功，苏秦身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，父母张乐设饮提前走了三十里地迎接儿子。嫂子更是匍匐在地长跪不起。苏秦问嫂子：“大嫂，你为什么前倨后卑，态度反差这么大？”嫂子回答：“因为小叔子现在做了相国，地位尊贵，有万贯钱财啊。”苏秦不禁感叹：“读书人贫困的时候，父母不把你当儿子看；发达了以后亲戚都来巴结你。人生在世，权势地位的力量真是强大啊！”没有做相国，并没有影响苏秦的学问才能，但决定了苏秦的生活境遇，决定了他能否实现心中的抱负。秦汉以来，做官更是成为衡量读书人贵贱荣辱和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，成为他人对待读书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。

读书人全往仕途上挤，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当上官呢？

最初的官位是世袭的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，王公卿士世代垄断官职。平民子弟想要跻身官场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，建立骄人的功绩。西汉之后，征辟制兴起，成为世袭制的补充。朝廷可以征召地方贤才，官员可以荐举孝子廉吏做官。征辟制为官场选取了部分德才出众的官吏。但这样的操作缺乏透明度，征辟的标准操于权贵之手，得官的人数也很少，对改变平民子弟的政治地位帮助不大。征辟制到魏晋时代被九品中正制代替，人才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九个级别，分别授予官职。权贵家庭把持评定，相互攀附，出现了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世族”的局面，形成了变相世袭的门阀政治。平民子弟的入仕途径依然窄小，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不大。权力垄断官位分配，导致大批身

体羸弱、不识五谷、畏马如虎的世族子弟20岁就能登殿入阁，而普通人家子弟即使才能出众，年过三十也仅可补为刀笔小吏，从底层做起。这是不公平的，也不利于政治体制本身的新陈代谢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隋唐科举制的横空出世，无疑是历史的进步。科举开放了政权，摒弃了种族、出身、地域、年龄、财富等外在因素，只考量个人学识，允许所有人自由竞争^①。所有想做官的人，只要能通过统一的考试就能入仕；相反，即便是王侯子弟，通不过考试也只能做一辈子平民百姓。这就排除了权力因素的干扰，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团，在理论上实现了公平公正。同时，考试剔除了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和碌碌无为的庸才，能为政治体制补充高质量的官吏。这对政治体制的高效运转和长远发展是有益的。所以，科举制设计秉承的公平公正原则和择才而用的做法，相对之前各项入仕制度有着巨大进步。

从诞生到1905年的一千三百年间，科举制在中国雷打不动。皇帝可以换，王朝可以变，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也在变，但开科取士的做法几乎没有变过。可见科举有它存在的理由。它以开放的姿态，高举公平公正的旗帜，给予所有人入仕的希望。希望在，梦想就在，就有大批人甘愿困守其中，支持这项制度。

然而，科举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问题，最终将自己逼上了死亡的悬崖。（1905年，科举制被废除了，但公平公正、择才而用的考试用人制度并未废除。）

首先，科举制在历史长河中所附着的越来越多的技术性规定，侵蚀了择才而用的制度内核，日渐偏离选贤用能的初衷。每一项制度设计的理念总需要具体的规章制度去落实，总需要配合时局、人事等各方面的变动而调整。这便产生了种种技术性的规定。这些后生的技术性规定会

^① 科举是有报考限制的，如娼妓、优伶、皂隶、乞丐等不能报考，家奴或谋逆之人也不能报考。但是，这些人的子孙只要脱离此项身份一定时间，一般是三代，就可以正常报考。所以，科举在理论上是向所有人敞开的。

逐渐摆脱人们的控制，沿着自身的逻辑独立发展下去。几百年后，人们回头看看某项制度，总会发现它和最初的设计并不吻合。具体到科举上，它后来发展出的众多规定中最受人诟病的，对它伤害最深的就是“八股取士”。

早期的科举，考试文章允许自由发挥，并没有固定要求。这就使得评判考生文章优劣的难度增大。考生的观点、行文习惯以及文章体例不同，考官们的标准也不同，总达不到人人满意的效果。总的来说，文辞华丽、行文流畅又有家学积淀的文章比较受欢迎。这种百家争鸣、没有统一标准的局面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得到了逆转。朱元璋是从社会最底层打拼上来的草根皇帝，讲究实用且带有较浓厚的平等思想。据说他主持科举考试和听取大臣汇报的时候，总觉得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写的文章华而不实、言之无物，堆砌的文辞和密集的典故让他抓不住重点。于是朱元璋萌发了统一文章体例格式的念头。也有说法是之前的科举考试有利于权贵人家的子弟出头（他们往往熟悉政治话语、家学基础良好），而不利于文笔朴素、不事雕琢的贫寒人家子弟，朱元璋从平等的角度出发，规定了大家必须写同样规格、同样内容的文章，尽可能地去家庭环境对考生的影响。朱元璋规定的标准文章就是“八股文”。

八股文有很多硬性要求。比如，文章的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，选取其中的句子或者段落为题。考生们也必须根据四书五经的精神作答。朱元璋原来想冒认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为祖先（他自己的祖先拿不出手），大臣们赶紧劝谏，说朱熹的年代离得太近了，不适宜当王朝的祖先。认祖不行，朱元璋就捧出朱熹对四书五经的解释来，作为全国读书人学习和考试的教科书。朱熹那些并不成熟或者零散的只言片语，摇身一变成了金科玉律。举子们只能运用朱熹之说，联系题义阐述道理。文章的格式也被限制得很死。全文分几个部分，每个部分怎么写，用什么句式，哪一句话亮出观点，哪一句话是引用都有规定。文章的主要部分分为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四个段落，每个段落要各写两段，因此得名八股

文。这八个段落的句法、字数都是有限制的，每一股的内容必须要有一正一反、一虚一实、一浅一深的对比。如此一来，考官的工作量大为降低，一眼就把卷子看得清清楚楚。但如此千篇一律的应试文章能反映出考生的真才实学吗？

朱元璋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他高度规范的文章要求遇到现实趋利的中国人就变了样。八股文很快堕落为死板、保守的牢笼。读书人聚精会神地研究八股文的格式、句法，将四书五经和朱熹文章从头背到尾，什么秦歌汉赋、什么唐诗宋词都抛之脑后，更毋论民心国情了。每次考试结束，高中者的文章便被收集汇编起来出版售卖。读书人奉之如宝，逐字逐句研究。因为四书五经中可用来出试题的句段有限，有钱人就在考试前聘请八股高手押题，写文章，然后给子弟们开“辅导班”、“加强班”，让他们专门背诵这些押题文章应考，竟然屡屡有得手考中的。

清朝名人王士禛说过一则沉重的笑话。有个后辈书生在读《史记》，本乡一位前辈进士过来问他：“你在读什么书？”书生说：“《史记》。”进士问：“谁写的？”书生回答：“司马迁。”“司马迁是哪年的进士啊？”“司马迁是西汉太史令，没有功名。”进士不悦，说：“原来没有功名啊。那我拿他的书来看看。”他拿过《史记》翻了几页，扔在一旁说：“此书于科举无益，看它做什么？”由此可想而知，八股取士选择的大多是死背少数几本书，只会写八股文的书呆子。明清笔记留下了许多又呆又木，生活了无情趣，更无动手办事能力的八股高手的形象。朱元璋争取平等和提拔实干人才的本意算是彻底落空了。

徐大椿的《道情》对八股高手有形象的描述：“读书人，最不济。读时文，烂如泥。国家本为求才计，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。三句承题，两句破题，摆尾摇头，便道是圣门高弟。可知道‘三通’、‘四史’，是何等文章？汉祖、唐宗，是哪一朝皇帝？案头放高头讲章，店里买新科利器。读得来肩背高低，口角欹歔，甘蔗渣儿嚼了又嚼，有何滋味！辜负光阴，白白昏迷一世。就教骗得富贵，也算是百姓朝廷的晦气！”顾

炎武曾愤慨地说：“八股盛而六经微，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。”“愚以为八股之害，甚于焚书。”焚书坑儒活埋的只有数百人，而八股取士禁锢的是数百年读书人的智商和精神。

八股文发展到后来，连皇帝本人也看不下去了。光绪皇帝有一次亲阅进士考卷，发现大多数考卷雷同，毫无用处，不禁感叹说：“以这种方式录用人才，也难怪学非所用。”（《清稗类钞》）

除了八股文外，还有其他技术性规定与择才而用的本意背道而驰。比如清朝中后期规定科举文章的字数以700字为限，不能超过；又比如科举考试阅卷的时候偏爱卷面整洁、笔迹工整的卷子，带动读书人花大力气去练习楷书和行文布局。清朝中后期历届高中者无不写一手工整规矩的楷书。尤其不应该的是，道光朝后对文字笔画吹毛求疵，一竖没写直、弯钩没提好等细枝末节都能成为落榜的理由。至此，考试沦落为书法游戏，与考生的思想见解无关了。

除技术性规定外，权力因素逐渐攻占了科举的方方面面，也逐渐埋葬了公正、公平原则。

科举兴起，权力因素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外，但在实践中始终虎视眈眈，一有机会就渗透进来。考虑到科举关系着国家权力要交给何人掌握，关系着王朝的长治久安，历朝历代都将科举制度视为天下政务的“根本”，领导重视、制度严密、奖惩鲜明。科场舞弊却屡治不绝，从未断过。《清稗类钞》的讼狱类开头就是大量的科场舞弊案子，犯案者夺名、杀头、抄家、全家罚作奴仆，可犯案者依旧前赴后继。科举的成功是维系和扩大权力的正途，是获取衍生权力和收益的起点，值得一代代人以身试法、以命相博。

明清科举彻底被权力因素攻陷。《清稗类钞》向我们展示了清朝科举的实际情况：每年五六月间，是确定正副考官、同考官的时候。北京城和各省省城就炸开了锅，有权有势者开始准备，晋谒或贿赂已经及可能成为考官的官员。考生入场的时候，正副考官自己中意要录取的门生

亲友，监考官员暗中答应录取的考生，再加上达官贵人们塞条子打招呼要求录取的考生，如麻如粟，占去了大部分的名额。考官们与其说是在阅卷，不如说是在权衡各方关系。关系户很多，录取名额有限，考官们必须反复推敲，比真正按照真才实学来评定高下更加辛苦。他们先按照打招呼的人的官爵高低来录取嘱托的关系户，如果官爵一样高，那就先录取升官潜力大、党羽多的人嘱托的关系户；其次是按照贿赂的多少来录取关系户，如果考生给的钱一样多，那就兼顾一下名声的高低、答卷的优劣。最后的录取名单，在写上那些必须录取的考生之后就没有几个名额了，再挑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孤寒考生，列名其上，以塞人口。顺天府的科举，因为地处京师，弊端最深。顺天府科举的正副考官和同考官们，一般是京城里的高官显贵，不用皇帝公布名单人们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有能力者早早地就有针对地做这些人的工作，“犒金载宝，辐辏都下”，“按图而索”，“万不失一”。

最后，《清稗类钞》的作者徐珂承认：“铨政（指科举取士）纵极清平，能免贿赂，不能免人情。”这里的“人情”指的是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关系网络、泛化的权力关系。人情比赤裸裸的贿赂厉害，考官未必会收贿赂，但他无论怎么样都摆脱不了泛权力的网络——事实上，很多关系户并没有向考官行贿。高官子弟往往不需要向考官行贿就能在考试中受到照顾。而一些富商子弟，即便是送了钱，也不一定能金榜题名。为什么？因为考官也是官，处于权力网络之中，受到种种关系的制约，也需要维系和扩大权力关系，提高地位，“虽未必尽纳财贿，而欲结权贵树党援之心则同”。“人情”不能免，也就意味着权力因素始终影响着科举选官，扼住了官场准入的咽喉。在仕途门口，贫寒子弟和普通人家的孩子们又一次成了弱势群体。

科举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助长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，只知有举业功名，不知有天下和百姓；只知有官爵品级，不知有人格和善恶。进而连累全社会弥漫着浓郁的“官本位”思想，功名恶化为评判人生价值的唯

一标准，腐蚀了社会的道德良知。一部《儒林外史》汇集了许多活生生的例子，书中满是触目惊心的话：“有操守的，到底要从甲科出身。”“如果有学问，为什么不中了去？”“只是有本事进了学，中了举人、进士，即刻荣宗耀祖……人生世上，除了这件事，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。”

先秦时代的读书人就有很功利的思想，将学问和能力作为追求富贵的工具，所谓“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。有这样的想法，无可厚非，只要它没有充斥于整个脑袋，没有成为言行的主导就行。政府也很早就用高官厚禄来吸引士人。只是，科举制强化了这种做法，放大了读书人的利禄之心。它把科举入仕捧为官场正途，视其他途径都是异途，给予有功名的读书人极大的实利和虚名，让社会错误地在“荣华富贵”、“科举功名”和“读书应试”三者之间画上等号。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就是宣传这一思想的急先锋。他写了一首流传甚广、宣传效果很不错的《劝读诗》：“富家不用买良田，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楼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有女颜如玉。出门莫恨无人随，书中车马多如簇。男儿欲遂平生志，六经勤向窗前读。”有了皇帝的提倡，有了金钱车马、良田美眷的现实诱惑，读书人便一头扎进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追求中去了。

清代畅销书《儒林外史》第十三回通过一个读书人之口讲述了时人对科举事业（举业）的态度：“举业二字，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。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，那时用‘言扬行举’做官，故孔子只讲得个‘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’，这便是孔子的举业。到汉朝用‘贤良方正’开科，所以公孙弘、董仲舒举贤良方正，这便是汉人的举业。到唐朝用诗赋取士，他们若讲孔孟的话，就没有官做了，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，这便是唐人的举业。到宋朝又好了，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，所以程、朱就讲理学，这便是宋人的举业。到本朝（明朝）用文章取士，这是极好的法则。就是夫子（孔夫子）在而今，也要念文章、做举